

《前鋒月刊》战争题材小说研究

张琳*

◁ 목 차 ▷

- I. 绪论
- II. 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战争书写
 1. 对反帝的不同解读
 2. 内外交困的边疆纷争
- III. 追求民族统一的内战书写
 1. 右翼文人对内战合法化的辩护
 2. 军旅作家对战争正义性的怀疑
- IV. 结论

I. 绪论

《前鋒月刊》¹⁾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核心社团——前鋒社²⁾最早出版的两份刊物之一³⁾。《前鋒月刊》除了论文、评论以外，主要刊登创作小说、诗歌，以及翻译小说等文学作品。该刊文学作品的艺术水平比较高，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例如黄震遐的剧诗《黄人之血》、小说《陇海线上》，万国安的小说《国门之战》等，都是公认的民族主义文艺代表作。有学者评价《前鋒月刊》“代表着民族主义文艺的最高

* 龙仁大学 国际交流教育中心 助教授

- 1) 《前鋒月刊》1930年10月10日创刊于上海，编者署名“前鋒月刊社”，实际上是朱应鹏、傅彦长等主编，现代书局出版发行，二十四开本。1931年4月10日出至第一卷第七期终刊。主要撰稿人有华兴、叶秋原、易康、谷建尘、范争波、朱应鹏、李赞华、徐苏灵、穆罗茶、王倜然和李金发等。
- 2) 1930年6月上海成立的“前鋒社”，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第一个社团，也是积极推进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核心社团。
- 3) 另一份刊物是《前鋒周报》，创刊于1930年6月22日，编辑者署前鋒社，实系李锦轩编，光明出版部出版。主要立足于理论倡导，刊登论文和杂评。

成就”⁴⁾。和其他民族主义文艺作品相比，该刊的作品中较少空喊标语式的口号，而是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激励民众为民族复兴努力，这与当时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普遍社会思潮相符合，因此受到了读者的认可。

早在1980年代，朱晓进就指出“在众多民族主义文学的刊物中，《前锋月刊》是最不可忽视的，它在整个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⁵⁾但到当时为止，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仍然是作为一个反题存在。对它的研究大多是从政治层面进行批判。21世纪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学界开始正视民族主义文艺作品的价值和意义。钱振纲、倪伟、周云鹏等学者都在自己的论文中比较客观地评价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⁶⁾遗憾的是，新世纪的研究者们对《前锋月刊》的讨论都是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整体框架中进行的，还没有单独研究该刊的论文。

《前锋月刊》尽管前后仅出版七期，但是作为月刊，容量较大，作品主题多样，内容丰富。⁷⁾其中战争题材的小说尤其引人注目，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文艺立场。特别是中东路事件、康藏纠纷等独特的题材，在其他文学流派的创作中很少见。民族主义文艺作家这方面的创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同时具有史料价值。而对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等扫清地方军阀的内战题材，具有明显党派性的民族主义文艺作家也有自己独特的书写。本稿选取《前锋月刊》刊登的6篇战争题材的创作小说为研究对象。分别是〈国门之战〉、〈胜利的死〉、〈老金〉、〈三里庙的黄昏〉、〈陇海线上〉和〈刹那的革命〉。拟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一方面厘清过去研究中，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对部分作品不太客观的批判。另一方面，探究民族主义文艺作家对各种不同性质战争的书写方式，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战争叙事表达民族主

4) 牟泽雄，《1927-1937国民党的文艺统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77页。

5) 朱晓进，〈从《前锋月刊》看前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03期)第41页。

6) 钱振纲，《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周云鹏，《“民族主义文学”论(1930-1937)》，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7) 《前锋月刊》刊登的作品主要有三类：一是理论和介绍性的文章，共有18篇；二是创作文学，其中小说所占比重最大，短篇和中篇小说16篇，另有第1至5期连载未完的长篇小说一篇。诗歌8篇。三是翻译小说，短篇翻译小说12篇，第2至6期连载的长篇翻译小说一篇。

义的中心意识，以期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价值和意义。

II. 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战争书写

1. 对反帝的不同解读

反帝和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两大主题。国共两党都将反帝视为根本任务之一，但是两党对反帝的定义存在着不小的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除了两个政党的根本政治理念不同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收到当时国际局势的影响。

1921年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通过签订《九国公约》等条约暂时调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关系，确认了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实际上使中国由被日本独占回归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这使日本受到一定的抑制，而美国的优势地位从客观上给中国提供了向英美式的民主化方向发展的机会。

然而，华盛顿体系将苏联的利益排除在外。此时的苏联刚刚经历了十月革命，正在西方大国的排挤下艰难求存，迫切希望将中国纳入到它的势力范围内。苏联政府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也在积极谋求与北洋政府和军阀们的友好关系，试图通过双重接触的政策来支持和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的实施，都证明苏联在中国的努力收到了成效。但是，1927年，北伐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蒋介石在清共后，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新的中央政府站到苏联的对立面，同时，使西方列强看到了实现华盛顿体系的希望。⁸⁾

如上所述，19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日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每个政治和军事力量都离不开外国势力的支持和帮助，而外国势力此起彼伏的角逐也深刻影响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反帝的定义。

8) (日)卫藤沈吉,《191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系》(《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0-128页参考。

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的解读首先是指英美帝国主义，即以美国为首的协约国，这是当时苏联在国际政坛上的主要对手。193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控制的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下进行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对共产国际无条件服从和对苏联无条件支持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除了后文将提到的中东路事件，甚至“九·一八”事变时，共产党人都按照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看作是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对立，是帝国主义国家企图武装进攻苏联，扼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信号。可以说，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的界定，首先是以是否与苏联对立为标准的。

另外，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帝国主义还包括本国帝国主义，在当时的一些文件材料中往往可以看到“号召士兵们起来反对武装的本国帝国主义”⁹⁾的说法。所谓本国帝国主义，指的是亲美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共产国际的宣传策略中，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的不是本民族成员的利益，它仅仅是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代言人。

而国民党则基于更纯粹的民族观，对帝国主义的内涵界定得更广泛。国民党尽管有亲美的立场，但是并不受英美协约国的控制。出于统一全国，中华民族独立和自决的宏伟目标，国民党将一切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的外国势力全部定义为帝国主义。既包括强占山东和东三省的日本，觊觎西藏的英国，也包括其他试图瓜分中国的列强。特别是苏联作为共产党的靠山，又将外蒙古分离出中国，更是被冠以红色帝国主义的称号。

由于对反帝的不同定义，民族主义文艺作家创作的反帝主题作品中有一些左翼作家不可能涉及的题材。例如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的中东路事件，只有右翼作家会将之归纳在反帝的主题之下。

刊登在《前锋月刊》第6期的〈国门之战〉是一篇以中东路事件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作者万国安¹⁰⁾以自己参战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加入了一些虚构的情节，写成

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常设反战委员会关于满洲问题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年) 第74页。

10) 关于万国安的生平，缺乏详细记载。在《前锋月刊》第5期〈编者的话〉中提到万国安和黄震遐一样，此时在中央军校教导团中服役，曾在奉军中参加过十多次战役。1932年他担任上海《时事新报》的随军记者，与时任《大晚报》随军记者的黄震遐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受黄震遐的怂恿，答应写出几年来军人生活的经过，从而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刹那的革命〉和〈国门之战〉两文中都以“万国安”为主人公，而黄震遐的〈陇海线上〉也有“万国安”的出现。尽管不能将真实人物和作品人物等同，但至少说明，这些作

了这篇艺术化的战地纪实文学作品。

中东路事件，是指1929年中国为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中东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中东铁路又称东清铁路或东省铁路，它是沙俄侵华的产物。¹¹⁾围绕中东铁路的归属权问题，中苏双方从7月末开始直到11月，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兰诺尔地区展开了数十次大小战斗。11月，苏军先后攻占扎兰诺尔、满洲里、海拉尔。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死亡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苏军胜。12月20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联签订《伯力协议》。12月26日，中东路事件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¹²⁾

《国门之战》主人公万国安与作者同名，是国民党国防军驻满洲里的一位连长，娶了一位温柔美丽的俄国女子流波为妻。中苏军事冲突开始后，万国安所在的十五旅奉命驻守满洲里，在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坚守国门数月，数次与苏军交战。伤亡惨重，最终不敌，满洲里失守。万国安侥幸突围成功，经蒙古回到祖国。小说结尾借两封两年后与战友的通信交代了被俘战士和驻守扎兰诺尔的十七旅的结局。

这篇小说描写了中国军人在武器装备及其落后的情况下，誓死保卫国门，奋勇杀敌的光辉事迹。歌颂了战士们的爱国热情和不畏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特别是塑造了民族英雄——冯庸的形象。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散家财办学校的冯庸当时作为东北冯庸大学的校长，组织了300余名学生成立歼俄义勇军，开赴前线。这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事件。万国安在小说中将冯庸写成一个亲自驾飞机侦查敌情，在数架敌机追击下死里逃生的英雄人物。不论是普通的国防军战士，还是民族英雄冯

品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写就的。至于作者是否参加过《国门之战》里描写的满洲里之战以及他是否娶了一位俄国间谍太太，均无法确认。冷川，《万国安与〈国门之战〉》(《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46页参考。

11) 19世纪末，沙俄为侵略中国东北，称霸远东，根据1896年的《中俄密约》，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沿路的各种器材而修筑的从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后来又根据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修筑了从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从而形成一条由主线和支线组成的2800余公里的“丁”字形的中东铁路。这条纵横贯穿中国东北三省的铁路成为沙俄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的工具和基地，实际上造成了沙俄控制中国东北的局面。潘有光，《中东铁路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5页参考。

12) 辛胜夏，《中国现代史》(首尔：大明出版社，1997年)第228-230页参考。

庸，在当时都激起了全国民众同仇敌忾，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勇气和决心，把民众长久以来反对侵略的民族主义要求推向了高潮。

〈国门之战〉作为一篇比较成功的战争小说在当时不仅得到了右翼文人的大力赞扬，介于左翼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杂志《涛声》上也发表了评论，称赞万国安描写军队生活与战争场面真实有力。¹³⁾但是由于中东路军事冲突的敌对方是苏联，这篇小说受到左翼评论家的强烈批判。当时，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左翼作家进行文艺批评时恪守着这样一条逻辑：谁反对苏联，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在中东路事件期间，中共甚至无视祖国领土被侵略的事实，还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¹⁴⁾不仅在当时，〈国门之战〉遭到了左翼文人的猛烈攻击，即使到1990年代，大陆文学史对该文的评价仍然缺乏客观性，“〈国门之战〉描写1929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苏弹共的中东路事件，夸耀国民党军官屠杀苏联人的血腥罪行。”¹⁵⁾

然而，近年来史学界对中苏问题的研究表明，苏联在这次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¹⁶⁾也有中国学者承认，今天看来，左翼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应该说是错误的。¹⁷⁾东北军和南京政府的行为有它的合理性。很多证据表明，正是苏联在中东路方面有损于中国领土主权的不良企图，才造成了南京政府和国内民众的反苏行为。中东路事件是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完成之后，日军侵华之前，首次面对的外国武装侵略，因此在处理该事件时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态度。¹⁸⁾一方面，向美、法、

13) 破屏，〈评「国门之战」〉，《涛声》第1卷第8辑，1931.9.26。

14) 1929年7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中东铁路事件的声明〉，提出为保卫苏联而战斗的口号，号召中国工人群众与苏联无产阶级结成同盟，进行反对中国和俄国白卫军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来电，发出第四十二号通告，强调武装保卫苏联。中共哈尔滨市党委研究室，〈中东路事件的历史真相〉（《世纪桥》，2009年第12期）第36页参考。

15) 黄志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略》（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44页

16) 80年代开始，随着史学研究的日益自由和中俄两国档案资料的陆续解密，对建国以来避而不谈的中东路事件的论述开始散见于学术刊物。如冯国民认为当时收回中东路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对中东铁路拥有主权，中国人欲收回自己的主权，是中东路事件的直接原因。冯国民，〈评“中东路事件”〉（《世界历史》，1986年第12期）第60-61页参考。

17) 周云鹏，〈“民族主义文学”的文学史命运〉《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2010年 第2期，第20页参考。

18)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7月13日，苏联外交部向中方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15日，蒋介石表示想要取消不平等条约，最重要的便是要收回中东路的主权问题，如若苏方不

英等国开展外交，期望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另一方面，进行了舆论上的宣传动员，各大报刊以大幅版面报导中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全国各地纷纷召开市民反苏大会，激起了民众的民族情绪。尽管中东路事件中国军事失利，损失惨重。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强硬立场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反帝反侵略的宣传是值得肯定的。《国门之战》作为为数不多的正面描写中东路事件的文学作品，更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国门之战》中有两处内容一直颇受非议，一是富有传奇性的“杀妻”，万国安发现自己的妻子是赤俄间谍以后，为国家民族亲自手刃了妻子流波。

当时，茅盾就质疑该情节的真实性。¹⁹⁾然而《国门之战》虽然是以真实经历为基础写就的一部小说，毕竟是文学作品。“杀妻”即使是虚构的情节，女间谍，大义灭亲等因素的加入，只是为了增强作品的可读性。这与后来的抗日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的用传奇化的故事来鼓舞军民士气是同一种性质。

还有学者认为“杀妻”的情节违背人性。房芳指出主人公在家庭惨剧面前的无动于衷的写法隐含了一种负面的倾向，向读者展示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正常的人性背道而驰的一面。²⁰⁾毕艳认为“老万为了国家残忍地杀死自己的妻子。疯狂的士兵已经失去人的本性。”²¹⁾

首先，万国安的妻子不是普通的妻子，而是一个外国间谍。主人公在杀妻后虽有情绪波动，但仍然坦然地说：“她为她的祖国，我为我的祖国。”正如万国安杀妻后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一样，流波在阴谋被识破以后，也是毫不犹豫地掏出枪对准

接受，我方便会抵抗到底。7月20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致全国将士电：“国家早日能够团结，苏俄亦何敢以非礼相加，英法之对俄强硬，苏俄皆贴然就范，今独敢以最后通牒加害于我，岂欺我泱泱大国无人耶。”南京国民政府的强硬姿态逐渐升级，在近代外交史上实属罕见，这种气势无疑鼓舞了全国军民收回中东路路权的士气。范明明，《南京国民政府对中东路事件的应对策略及其影响》，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9-10页参考。

19) 茅盾认为：“《国门之战》是谣言说谎的结晶。一切战争小说里应有的谎都有在那里。”在他看来，万国安杀妻时间没有在任何新闻报导中被提及，其真实性极其可疑。石萌(茅盾)，《黄人之血》及其他，《文学导报》第1卷第5期，1931年9月。

20) 房芳，《1930-1937：新文学中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86页参考。

21) 毕艳，《三十年代右翼文艺期刊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第136页。

了自己的“丈夫”。对她而言，这场婚姻只是为了祖国的利益而接受的一次间谍任务，没有也不应该夹杂丝毫个人感情。在战争中，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如果万国安没有杀死流波，那就是被流波所杀。

其次，必须强调《国门之战》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文艺作品。民族主义文艺作家经常在创作中将民族国家利益与个人的爱情家庭对立起来写。因为他们坚信国家利益是高于个人得失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形式上建立了现代的民族国家，但是在内忧外患中它既没有统一全国，也不能完全有效的行使中央政府的职权。提倡民族主义是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弱势政府证明自己合法性，提高统治效率的有效手段。安德森在提出民族是被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时就强调：“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去屠杀或从容赴死。”²²⁾将全体国民归属于民族这一神圣的共同体之下，强调民族成员人人平等，国内各民族平等，既可以凝聚民心，又可以缓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同时可以向每一个民族成员提出要求，在民族的集体利益受到损害，或者政府宣布民族利益受到损害时，民族成员必须为了维护民族的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

由于创作的思想基础不同，民族主义文艺作家绝对不会因为杀的敌人是妻子就质疑主人公的人性，相反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和值得赞扬的。不仅仅是夫妻，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涉及民族大义时，为国家舍小家是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类似的例子在其他民族主义文艺作品中，比比皆是。例如《胜利的死》中杨营长明知胜利无望，仍然抛家弃子，走上了战场。《三里庙的黄昏》中儿子黄小顺为了革命多年弃老父老母于不顾。

另一处受到非议的情节是处死俄国间谍的场面描写。国防军抓获了六个破坏铁路的苏联间谍，残忍地用斧头劈死了他们。

三个俄国人，三个不知国籍的人，嘴里都塞满了东西，眼睛露出了很凶的神气，似乎他们很欢迎死。旅副叫我先收拾一个，我那时吃了点高粱酒，并且看见了仇人是很喜欢杀掉他们。我用了一把大斧，抡起来照着绑在屋里左边上的黑头

2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页。

发的人太阳上就是一下，差不多斩到了鼻梁上了。那个人的头上着了这一斧，太阳立时陷落下去，斧刃的四围都成了白色，我把斧子拿下来，紫黑色的血就跟着飞射出来，那人临死的哀鸣也就很小而短促的一叫就完了。不大功夫，我们这几个屠夫弄得血肉狼藉，一股血腥的气味要不叫吃酒也就呕出来了。²³⁾

早在《国门之战》发表之初，瞿秋白就曾据此将民族主义文艺斥为屠夫文学。²⁴⁾又有学者认为“行刑者凶残的面貌一览无遗……表现出他们嗜血残暴的欲望，这也正是一种非理性的偏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展示。”²⁵⁾关于处死间谍的情节过于残忍的问题，首先，战争文学中血腥和暴力的场面本来就不可避免，其次，作者万国安本人是一个职业军人，因此他的写作风格与一般知识分子作家存在着一定差异。从军经验决定了他对血腥场面的感受远不如知识分子作家敏感。也可以说由于见惯了战场上的流血和死亡，军人对暴力和血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麻木。所以万国安在写到杀戮和死亡时，态度是冷静而漠然的，体现了军人在实战中养成的彪悍性格。在万国安看来，军人应该毫不犹豫地杀死敌人，这在对方也是“光荣的死”。

总而言之，《国门之战》的文学成就虽然不是很高，但它以文学史上罕见的中东路事件为题材，通过对国防军英雄抗敌的正面宣扬，表明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对抵抗苏联入侵，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折射出国共两党对反帝的不同定义。

2. 内外交困的边疆纷争

1930年代，国共两党除了对反帝有不同的解读以外，对蒙古、西藏等边疆问题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后来改名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在民族自决的名义下，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受此影响，内蒙古部分激进蒙古王公贵族也发起了具有分裂倾向的自治运动。蒙古的先例为中华民族的持续分裂敲响了警钟。

与此同时，西藏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中央政府。西藏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在英国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愈行愈远。南京国

23) 《国门之战》(《前锋月刊》第6期)第34页。

24) 史铁儿(瞿秋白),《屠夫文学》,《文学导报》第1卷第3期,1931年8月20日。

25) 毕艳,同上文,第136页。

民政府建立后，坚持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蒙藏与新疆问题的决议案，把西藏定位为“稍成特殊形式”的地方性问题，强调西藏与内地的一致性，希望通过宣慰，化解隔阂，改善关系，形成同一“国族”，“造成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²⁶⁾之后，国民党蒙藏委员会一直积极实践这一方针，但是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和实际上相对独立的状态，以及英国势力的介入等问题，使得统一的目标很难实现。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西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1929年9月，又制定了《解决西藏之具体办法》十条，明确提出，在国家统一下，西藏的外交和国防权收归政府，同时，国民政府不改变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维持达赖、班禅已有的政教权限，给予西藏充分的自治权。表面上南京国民政府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但值得注意的是空有政策，始终没有列出具体自治方案，而且之后又设立西康省。可见所谓西藏自治，很大程度上是缓兵之计，国家统一仍然是国民政府的最终目标。

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目标相反，当时受共产国际支配的中国共产党则主张边疆民族“自决”“独立”。斯大林在1921年就明确指出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的民族政策是：“放弃对非俄罗斯民族所居住的各区域的一切任何要求与权力，承认这些民族有独立的国家生存之权。”²⁷⁾受此影响，早在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的第八条就提出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该民族自决。1929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要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等民族的自决权。之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重要文件中继续强调蒙古、西藏、新疆等中国边疆地区有实行民族自决，建立国家的权利。直到1941年，“民族自决”的理论才得以纠正。²⁸⁾

正如杜赞奇指出的：“孙中山等中国民族主义者抱着人多力量大的信念，认为

2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1编 政治(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4-85页参考。

27) 斯大林，〈十月革命与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的民族政策〉(《论民族问题》，东北书店，1948年)第47页。

28) 徐中林，刘立敏，《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的西藏政策》，《烟台大学学报》第21卷第2期，2008年4月，第83页参考。

在战乱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心协力抵抗帝国主义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²⁹⁾但值得深思的是,当时处于相对独立状态的少数民族,是否愿意无条件地接受这种民族政策呢?会不会将此理解为另一种变相的帝国主义压迫呢?因为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少数民族对民族自决的要求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实际上,孙中山在提出“五族共和”主张时,中华民族的思想还未普及于大众,就是孙中山自己也认为民国所需要的是国内各民族平等互助,所以当时的“五族共和”是指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但是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不断入侵和中华民族概念的日益成熟,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坚定团结国内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³⁰⁾正是因为将蒙、藏等少数民族看作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因此宣扬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政府只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而将少数民族的独立要求视为不合理。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最初主张的各少数民族独立的政策是因为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中帝国主义性质的一面,那么1941年以后至今中国共产党要求少数民族保持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团结政策应该也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理念。当然,这种维护中华民族统一性,独立就是分裂的思想是否能被少数民族接受是值得怀疑的。

由于西藏地理位置偏远,加之汉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1930年代文学中涉及这一主题的作品并不多见。特别是左翼文人,受共产党民族自决政策的影响,将西藏、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独立要求,视为民族独立运动。与此相较,民族主义文艺作家旨在维护统一的关于边疆问题的创作就更值得重视。

易康以西康地区民族纠纷和帝国主义侵略为主题在《前锋月刊》发表了三篇小说³¹⁾,其中《胜利的死》是以1930年6月爆发的第三次康藏纠纷³²⁾为背景写成的。

29) (美)杜赞奇 著,王宪明等 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30) 陈健夫,《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41页参考。

31) 除了刊登在第1期的《胜利的死》,还有第3期的《阴谋》和第4期的《盗宝器的牧师》。《阴谋》与《盗宝器的牧师》内容相互穿插,讲述英美传教士和探险家打着传教和探险的幌子,掠夺西藏地区丰富的资源。

32) 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西藏地方与西康地方之间先后发生了三次康藏纠纷。1930年6月,甘孜县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因争庙产发生纠纷,遂致驻西康边防军与向西康辖境进攻之藏军发生武装冲突,第三次康藏纠纷随之爆发。经过中央政府派员调解,双方多次谈判和反复交涉,这次纠纷历经十载终告结束。王燕,《浅析第三次康藏纠纷》(《民国

主人公杨营长是驻守西康省城打箭炉的一名国防军军官。他忧国忧民，洁身自好。藏蛮在英国人的煽动下造反，试图把汉人赶出康藏地区。杨营长明知毫无胜算，仍然领兵出征，最终为国捐躯。

〈胜利的死〉中杨营长虽然要带领由汉人组成的国防军对藏军作战，但他本人却非常同情藏蛮。他感叹道：

蛮族应同情，因为在汉人许多年代的统制下，并没有给他们相当的教育。……而且所谓五族共和，根本没谈到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造反，根本上是无知的蠢动，他们推翻汉人统治，那样英国人在政治上是代替了汉人，把西藏做殖民地。³³⁾

藏蛮造反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没有国族概念，只知西藏，不知中华民国。只信宗教，不了解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但政教合一是西藏地区自古以来的政治制度，封建时代的中央政权对此一直予以默认。对藏民来说，宗教领袖就是地区政治领袖，很难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接受现代化的国家理念和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政府空有五族共和的政策，却没有具体如何对待藏民，有效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派来了汉人镇守使，只知道敛财享乐，不解决任何问题。配备了国防军，但全军官兵都沉迷于鸦片，毫无战斗力。国民政府的驻军既没有为安分守己的藏民提供保护，也不能对造反的藏军造成威慑。相反他们经常扰民，反而使汉藏矛盾不断加深。这就印证了前文所提到的，站在藏民的立场来看，国民政府可能与英国一样也是一种变相的帝国主义势力。

另一方面是受到了英国人的煽动。英国人试图在西藏制造混乱后将之变为殖民地的狼子野心总所周知。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尝试，始于18世纪下半叶。1904年，英帝发动了侵藏战争。1911年，清朝被推翻，外蒙宣告独立，这些剧变为英国扩大对西藏的侵略提供了机会。英国对西藏的政策是维持西藏自治，使西藏名义上处于中国宗主权下，但实际上绝对依赖英印政府。为此，英国一手策划了1913到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举行的中英藏三方会议，怂恿西藏与中国对抗，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虽然西姆拉会议计划破产，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牵制了英国的注意力，

档案》，2003年第2期）第105页参考。

33) 〈胜利的死〉(《前锋月刊》第1期) 第221页。

但英国觊觎西藏的野心一直未变。³⁴⁾

战争表面上是发生在汉军和藏军之间的冲突，实际上背后是中国人和英国侵略者的对抗。具有中华民族意识的主人公杨营长深知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战争不论谁胜谁负，都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只有背后的英国人能坐收渔利。但为了解决眼前的混乱又不得不打，在这种矛盾的死结中，杨营长感到无比苦闷，最终只能用以身殉国来全自己的爱国之心。

西藏问题内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汉藏矛盾，外有英国势力的觊觎和干涉。弱势的南京国民政府空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政策，但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使其难以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作者对长久以来积累的民族矛盾和历史上海人对藏政策进行了反思，强调抵抗英国帝国主义侵略对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同时对南京国民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举步维艰的被动局面表示痛心和无奈。

III. 追求民族统一的内战书写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革命军在广州正式誓师北伐。革命军一路北上，先后打败了直系吴佩孚和新直系孙传芳，于1928年6月和平进入北京，同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北伐告以段落。有学者指出：北伐战争，人力财力物力均处于劣势的国民革命军一举战胜处于优势的北洋军阀，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有统一全国的愿望。³⁵⁾

国民军北伐的胜利造就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崛起，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但是在地方军阀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要想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34) 胡岩，〈中华民国时期中英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 第1期) 第105-107页参考。

35) 1920年代初，北京的中央政府已经逐渐失去了驾驭国家的能力。大小军阀割据局面已经形成。向往统一虽然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和各政治流派都认同的时代愿望，但是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内斗空前，也未产生出确定的赢家，结果北洋内部及民间对于一个有力的军阀可武力统一中国的信心丧失了。个别军阀如吴佩孚有心无力。局势就僵持在军阀各自为政，互相制约的情况。当时国民党(包括与之联合的共产党)是唯一有统一全国的愿望并具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第4页参考。

民族国家，必须继续北伐未完成统一大业。而各地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在不断讨蒋。政府中央军与尚未收复的军阀势力之间的内战不可避免。1929至1931年间的蒋桂战争后，1930年春又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³⁶⁾。通过内战，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消灭了几支最大的地方军阀，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但是也使整个国家元气大伤。

在左翼文人的书写中，国民党军队与地方军阀的混战无疑是南京国民政府不思抵抗外辱，热衷内战的证据。内战造成的民不聊生正说明国民党政权是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府。面对同样的题材，民族主义文艺作家则聚焦于战争的目的是统一，对内战进行了不一样的书写。

《前锋月刊》中以内战为题材的小说从北伐军和中央军的立场进行战争叙事，对内战的必要性进行了宣传，为其合法性进行了辩护。更难能可贵的是，尽管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具有明显党派性的“遵命文学”，民族主义作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忠于自己的感受，对战争的正义性提出了质疑。

1. 右翼文人对内战合法化的辩护

徐苏灵的³⁷⁾《老金》和《三里庙的黄昏》都是以北伐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分别刊登在《前锋月刊》第4期和第5期。这两篇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而是将焦点对准了战争背景下普通老百姓的苦难生活和心路历程。

内战的本质始终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自相残杀。因此，在内战中，军事实力固然重要，是否能取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在道义上占据有利的制高点也对战况具有决定性作用。作者为了证明革命军正义性和合法性，一方面极力渲染地方军阀的恶行，另一方面强调了宣传对改变民众思想的作用。

36) 中原大战是辛亥革命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最烈，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军阀混战。它历时七个多月，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万，死伤三四十万。史全生等著，《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3页参考。

37) 徐苏灵(1910~1997)生于上海。1930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画系，后任哈尔滨艺术学院西画系教师。1931年初来上海，担任《春潮》、《矛盾》等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同年冬，参加进步戏剧活动，曾导演或参与演出《乱钟》、《国民公敌》等话剧。1934年，进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此后一直担任电影编导。

小说中的北军和联军都是北伐战争中溃败的地方军阀部队。在北伐革命军面前，他们是失败者，但是由于拥有武器，在平民百姓面前又是绝对的强者。失去纪律的约束，又处在前途未卜的困境，使败军与土匪无异。

〈老金〉中，平静的小县城因为兵败逃窜而来的北军陷入一片混乱。不仅商店都关了门，人们也都不敢上街。年轻的女人当街遭到强奸。年轻的男子被当成革命党抓走。北军占领县城后，马上选出会逢迎拍马的当地人做长官，替自己搜刮民脂民膏。而民众还要对此感恩戴德，因为只要交了钱，就可以免受凌辱。

〈三里庙的黄昏〉中，村民们讨论联军的恶行更加血腥恐怖。

“联军要来拉夫呢。他们打败了，要逃，要拉夫替他们抗东西啊。”“总之遭劫了。联军来城里抢劫，而且奸淫人家的妇女呢。”……“昨天老吴从城里来说，联军杀了革命军的侦探，还要把他的心，挖出来吃。”“你还没有听说过，联军上次捉到两个女革命党，他们先把她们轮流地奸了，又把她们赤条条一丝不遮地叉手叉脚钉在墙上，然后用尖刀刺她们的乳，刺她们的下体……”³⁸⁾

这些传闻刺激着村民的神经。让他们对联军的到来更加惶恐不安。

民族主义文艺作家强调和渲染地方军阀的暴行，无疑是要激起民众对他们的仇恨，从而对革命军产生好感，进而支持革命。在民族主义文学中，地方军阀既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也是妨碍国家统一的敌对势力。只有把地方军阀塑造成恶贯满盈的土匪，才能反衬革命军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正义形象。

同时，这两篇小说都表现了北伐军的宣传促使民众对革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国民党发动北伐时，北洋政府虽然混乱不堪，但仍然是当时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国民党挥师起义是对中央政府的挑战。要想获得民众的支持，必须要证明自己的正义性。因此，国民党非常注重的宣传，配备专职的政治军官随军，专门负责政治宣传工作。一方面通过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小册子，在识字阶层民众中宣传国民党的党义和党纲，宣传北伐军的正义性，争取地方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直接针对地方军阀高层将领进行宣传和策反，造成倒戈，从而大大加快了北伐的进程。而且国民革命军士兵受过要友好对待民众的教导，不准抢劫或强征劳动力入伍。因此北伐期

38) 〈三里庙的黄昏〉(《前锋月刊》第5期) 第127页。

间出现了许多关于国民革命军的正面报导，比如受到热烈欢迎，农民卖食品给士兵，还给革命军当间谍、向导、搬运工，为伤员抬担架等。³⁹⁾ 北伐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是有效的宣传的确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老金〉的主人公老金因为北军的到来，失去了生计。他厚着脸皮要求妻子向北军卖身，但又感到屈辱和痛苦。促使老金思想发生转变的是革命党人的宣传。街上人们私下的议论，年轻学生的演讲和宣传小册子，夜里散发的传单，使老金心情激荡。黎明时分的革命军进攻的炮声再次刺激了老金。他杀了酣睡在妻子床上的北军连长，毅然决定要做一个革命党人。

老金从一个出卖妻子的懦弱丈夫成长为愿意为革命牺牲的男子汉，他的觉醒既说明民众是潜在的革命力量，也揭示了革命宣传的重要性。

〈三里庙的黄昏〉叙述了一个忠孝难两全的故事。黄老顺倾家荡产供儿子黄小顺去外省上学。不料儿子参加革命党，村民们害怕受到牵连，排挤和欺辱黄老顺。黄小顺带领革命军回到村子，虽然在老父面前为自己的不孝深深忏悔，但他秉持民族主义忠孝观，坚信国家民族的利益大于家族利益，为国尽忠比在家尽孝更重要。他请求父亲原谅自己，并帮助自己说服村民们支持革命军。

大概村里的人们一知道我回来了就会把我捉起，人们太恨革命军了，因为他打败了联军，联军就到内地和乡下去抢劫奸淫。这正是一段灾难的过程，很难有法子避免的过程。如果人们肯知道革命的意义得再多点，就譬如爸爸能了解儿子的任务的重要的意义时，一切都可原谅了。⁴⁰⁾

民族主义文艺作家认识到民众对革命军的仇视源于不了解革命的意义，更直接的原因是把联军的恶行归罪于革命军的起义。在闭塞落后的乡村，绝大多数人不识字，风起云涌的社会变化和其后的意义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在农民的眼中，革命军的出现与联军进村抢劫奸淫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表面的因果关系让只想安分守己的农民对革命产生天然的抗拒和厌恶。

黄小顺的战友则在联军就要进村的危急关头简单明了地说服了村民们。

39) 韦慕庭,〈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32-1928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63页参考。

40) 〈三里庙的黄昏〉，第132-133页。

联军来了，他们来一定要抢劫奸淫，所以革命军便衣队就在村口截住了他们的路；但是他们人数很多，便衣队一定打不过他们。那么，我们应当从后面围夹上去，帮助便衣队。⁴¹⁾

村民们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明白了革命军是来保护和帮助他们的，才转而支持革命军。如果说黄老顺的转变，是出于对儿子天然的信任和期望。那么村民们从仇视革命军到帮助革命军，则是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即使民众并不理解革命的意义，只要厘清真正的因果关系，就可以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也说明革命宣传的时机和技巧非常重要。

〈老金〉和〈三里庙的黄昏〉的背景是为了扫清军阀而进行的内战。国民党动员群众的宣传思路是将军阀视为民不聊生的祸乱根源，是与帝国主义并列的需要铲除的革命对象。把革命军与地方军阀构建为“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模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以“革命”为名的北伐战争寻求合法性。

2. 军旅作家对战争正义性的怀疑

同样是民族主义文艺作品，有实际参战经验的军旅作家对战争的书写无疑更加真实。发表在《前锋月刊》第5期的小说〈陇海线上〉和〈刹那的革命〉表现了军旅作家对战争的独特感受。

〈陇海线上〉取材于作者黄震遐⁴²⁾本人的在河南参加中原大战的从军经历。作者基于亲身体验，对战争的过程叙述详实，战争场面也描写得十分真实。而以中央军立场进行的战争叙事，将中原大战纳入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中来，符合民族主义文艺所要求的中心意识。因此，这篇小说受到了右翼文人的赞赏和追捧。⁴³⁾

特别是这篇小说生动地描写了河南百姓对中央军仇视的态度，并对此做出了分

41) 同上书，第139页。

42) 黄震遐(1907-1974)，广东南海人，笔名东方赫。学生时代即开始文学创作。曾在《雅典月刊》、《真善美》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多篇。大约于1930年5月投笔从戎，进入中央军校教导团，随即开赴中原大战前线。

43) 现代书局为其所作的广告称之为“热烈的、前进的、伟大的战事小说，压倒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第2期，1931年5月。

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派出中央军征讨地方军阀，本应该受到欢迎和礼遇，但是事实恰恰相反。

沿途年轻力壮的农夫们都恶狠狠地望着我们，使我幻想到红枪会的危险。……老百姓是顽固的，无可劝解的，他们脸上杀气腾腾的表示，便是证明他们心中对于我们的厌恶，简直要吃我们的肉。……他们这些人真可怜，什么什么都不晓得。打仗，他们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丝毫不以为奇。国家，他们连自己是河南人都不晓得，更何况国家……自从民国十六年起，张宗昌便在这一带和冯玉祥打仗，一直打到现在。老百姓对于屠杀、焚烧、奸淫掳掠的故事，都已看得不要看，一望见穿上制服的人就发生同仇敌忾之心，马上想动手收拾掉他。所以河南境内，民众自身的团结力也特别大，所有的土匪，黄龙会，红枪会等，都只不过是民众变态的自愿兵保卫团而已。只可惜他们对于国家没有丝毫的了解，尤其是看见了我们的中央军也发生厌恶之心，遂于不知不觉中，将一个完好的民族运动，改写为迷信扰乱的土匪行为。⁴⁴⁾

这里一方面真实地反映出河南老百姓对战争的厌恶和仇恨，另一方面点明中国的普通百姓还完全没有国家意识，他们的全部认同只局限于家庭、宗族和乡土的狭小范围。他们对战争的憎恶只是出于本能，并不关乎战争的目的。不管交战双方是谁，只要是破坏了他们平静生活，使他们流离失所，就是仇恨的对象。

有学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一般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极其薄弱，而这正是民族主义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⁴⁵⁾ 国民党提倡的民族主义在沿海发达城市的识字阶层中虽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中国内地广大的乡土社会，对于教育落后信息闭塞的老百姓，还是没有丝毫渗透力。扫除残余军阀势力的内战，是从军事上统一全国的手段。培养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是从思想上推动民族国家建设的方法。民族主义文艺作家意识到后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如果没有具备民族意识的国民，全国统一的进程不仅受到影响，统一以后的国家建设也将举步维艰。归根到底，民族主义文艺作家沿袭了北伐时期的宣传策略，强调民族意识的宣传必须与军事行动同步或先行。

另外，这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滑稽的叙述方式，种种可笑又可悲的情节给

44) 〈陇海线上〉，《前锋月刊》第5期，第67-68页。

45) 倪伟，同上书，第142页。

全文带来了强烈的反讽效果。作者说自己从军只是出于无聊，短暂的军旅生涯更像一出喜剧和闹剧。他将自己所属的轻甲车连形容为“伟大而滑稽”，因为所谓的轻甲车不过是改造过的摩托车。从南京到柳河的火车上，自嘲不晓得自己是人或畜生，也不明了自己是到千里之外去立功或送死。在战场上，一边幻想着欧战电影中的战地恋情，一边又嫌弃河南女人终年不沐浴，裹着臭脚。而经历过的最激烈的战斗，不是与军阀展开，是和几个战友鲁莽地组织了一支远征队，在高粱地里和当地土匪发生的军事冲突，牺牲了战友，白费了弹药以后，狼狈逃了回来。

《陇海线上》就取材来讲，是中央军讨伐地方军阀，无疑是表现民族主义的好题材。尽管作者的初衷是要宣扬国家统一和民族主义精神，但在这些叙述中，很难感受到作者作为中央军的正义感和自豪感，相反在作者可笑的经历和悲哀的内心独白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作者对战争的荒诞感受，这种荒诞感打破了战争正义的光环，提醒人们认识到内战的本质。可以说《陇海线上》是一个建构民族主义同时又自我解构的文本。

万国安的小说《刹那的革命》则更加赤裸裸地表达了对战争正义性的怀疑。这篇小说以郭松龄倒戈反奉为背景。郭松龄原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一员猛将。1925年，郭松龄听闻张作霖正在日本购买武器，要与南方的国民军开战，愤慨至极。11月，在滦州起兵反奉，率七万大军将奉军逼退到辽河东岸。在攻打新民县时，却遭到日本关东军袭击，一败涂地。12月25日，郭松龄被枪杀。这场牵扯到日本势力的地方军阀之间的混战，很难说清究竟哪一方是正义之军。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刚刚参军的东北军军人，胡里糊涂地跟着部队去追讨郭军。在东北军的立场看，倒戈的郭松龄，是需要清算的叛徒。东北军是应该是正义的代表。作者也赞扬战士们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可是东北军的一些事迹却实在是让人汗颜。每到一处驻军，都强征民居。甚至有士兵晚上借口借火点烟，进入民居，强奸妇女。战斗准备时，“我”还发现几个炮手居然是日本人，暗示当时奉系军阀与日本势力相互勾结。为了解决民族内部的矛盾，不仅民族成员自相残杀，还要借助外国侵略者的势力，战争的意义更加混乱和荒诞。

在经历了激烈的战斗后，获得了所谓的“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却让人更加困惑。

这时我们都带着胜利的微笑，向新民县前进，稀微的晨光，映照每个人的脸，许多的部队的兵都挺胸走着，嘴里唱着歌，比战败了异族都快乐。……我们踏进新民城里时，他们所说的那俘虏一队一队的向奉天城押送了。我细细看去，那俘虏的面貌和制服，都和我们是一样，因为什么管他们叫俘虏呢？⁴⁶⁾

在小说的结尾，“我”与叔父戏剧性的相遇，更加具有讽刺意味。三个月前，“我”给从军的叔父送行，祝他凯旋。三个月后，叔父做了我们的俘虏，恭喜“我”凯旋。而且“我”的营长就是叔父讲武营的同学。于是刚刚在战场上生死相拼的敌人，回过头就亲昵地在一起喝酒吃肉。酒桌上，通过叔父的话作者点明了郭松龄倒戈是为了呼应广东的孙中山革命。最后大家得知郭军长死讯后，屋中空气沉寂，叔父面露愁苦，含着泪放下了酒杯。

此时作者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看待这场战争，革命军追求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东北军作为地方军阀坚持割据。那么支持革命军的郭松龄是作为民族主义的功臣牺牲的。刚刚战败成为俘虏的郭军似乎又变成正义的代表。

不管是革命军、郭松龄军，还是东北军，都声称自己是正义的。但是战火中流离失所的百姓，牺牲流血的战友，来帮助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日本军人，和我们面貌和制服都一样的战俘，各种混乱的意象集中在一起，表现了作者内心的困惑。全国统一，民族解放这些高尚的目标，无法掩盖在战场上与亲人、友人生死搏斗的事实。战斗结束后，胜者和败者亲人重新团聚，友人把酒言欢，刚才的性命相拼又显得如此可笑。作者用荒诞的实在解构崇高的精神，强调内战的实质是同胞之间自相残杀，追问战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陇海线上〉和〈刹那的革命〉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战争的荒诞，表达了作者对战争正义性的怀疑。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小说的作者都是军旅作家，实际从军经历使他们比知识分子作家更清楚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直面流血和死亡促使他们更深刻地思考战争的意义。除了对内战正义性的怀疑，在这两位作家的其他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战争中暴露出的其他问题的反思。例如万国安在〈国门之战〉中，对军官只顾自己安危，不顾士兵生死进行了批判。再例如黄震遐在以“一·二八”事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上海的毁灭》中，将前方将士血洒疆场，与后方都市男女们

46) 〈刹那的革命〉(《前锋月刊》第5期) 第117-118页。

仍然纸醉金迷进行对比，表达了对这个畸形社会的不满。

这些创作表明民族主义文艺作家并不都是政府的传声筒，有的作家即使站在民族主义文艺阵营，将创作的重心放在宣扬民族主义，但仍然忠于个人的主观感受，对问题和弊端保持批判的态度。这也说明尽管民族主义文艺强调中心意识，重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尊重文学的独立性，允许作家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IV. 结论

总而言之，《前锋月刊》作为一份知名度较高的民族主义文艺杂志，可以代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前期的艺术成就。该刊发表的战争题材的小说，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对抵御外辱的反帝战争和追求统一的国内战争进行了独特的解读。

由于国共两党对反帝的不同定义，以及对边疆问题截然不同的态度，民族主义文艺涉足到一些主流文学史上不常见的题材。〈国门之战〉对中东路事件的正面宣扬，表明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对抵抗苏联入侵，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今天重读该文，还具有还原历史真相的史学意义。〈胜利的死〉关于康藏纠纷的悲情书写，表达了国民党力图保持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平等相处，共建国家的民族主义愿望，也证明了弱勢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中难以实现五族共和的历史任务。

民族主义文艺作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强调了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等内战的目的是统一全国，建设民族国家。〈老金〉和〈三里庙的黄昏〉以北伐战争为背景，突出了军阀的恶行，证明革命军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同时强调宣传可以促使民众支持革命军。〈陇海线上〉与〈刹那的革命〉一方面赞扬了战士们为了民族统一英勇作战，另一方面通过参战者对内战的荒诞感受质疑了战争的正义性。

《前锋月刊》的战争题材小说，让我们从文学的层面透视到国民党对帝国主义、边疆问题和国内战争的政策与态度，也折射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观。历史学者罗志田强调，在近代中国政治中，民族主义的反抗与建设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⁴⁷⁾在

47) 罗志田，《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的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参考。

193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将民族主义的反抗解读为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决。而建设就是反对分裂，建立由中央政府有效统治的统一国家。分裂的威胁既来自地方军阀割据，也包括共产党的苏维埃运动。《前锋月刊》的战争题材小说表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两个重要主题。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虽然具有明显党派性的“遵命文学”，但是民族主义文艺作家，特别是参与前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作家，对民族主义的追求并不完全源于遵照国民党的指示。民族主义尽管是19世纪后期才从西方传来的概念，但在中国近代史上，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中都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因此很多作家加入民族主义文艺阵营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自己的主观经验做出的自发选择。这从“前锋社”成员多种多样的身份就可以窥见一斑，该社成员中既有范争波、朱应鹏这样立场鲜明的国民党官员，也有傅彦长、汪恂然这样思想较温和的文化界人士，还有王铁华、汤增扬、黄奂若、邹枋这样刚刚走出校园的思想激进的文学青年。“前锋社”作为一个民间文学社团，能聚集各阶层的人士，形成较大影响力，说明民族主义文艺的口号在当时的确有一定的号召力。民族主义与民族性、民族情感的共生关系，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艺术探讨背后的政治欲望。民族情感的唤起，吸引了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和文学青年。通过对《前锋月刊》战争题材小说的分析，还可以发现他们在创作中除了按照国民党的期望，正面树立中心意识，宣扬民族主义以外，也对政府政策和社会现状进行了自己的思考，对推行民族主义过程中产生的弊端提出了批判。例如对南京国民政府空洞的边疆政策的针砭，对乡土民众毫无民族意识的痛惜，对国防军和中央军战斗力低下的嘲讽，对没完没了的国内混战的质疑等。遗憾的是，这种批判和质疑的声音在以往的研究中，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说明关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

【参考文献】

- 《前锋月刊》1-7期, 1930.10.10-1931.4.10
- 石萌(茅盾), 〈〈黄人之血〉及其他〉, 《文学导报》第1卷第5期, 1931年9月.
- 史铁儿(瞿秋白), 〈屠夫文学〉, 《文学导报》第1卷第3期, 1931年8月.
- 朱晓进, 〈从〈前锋月刊〉看前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86年03期.
- 冯国民, 〈评“中东路事件”〉, 《世界历史》, 1986年第12期.
- 史全生等著,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开封: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
- (美)费正清, 费维恺 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1编 政治(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年.
- 黄志雄,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略》,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年.
- 辛胜夏, 《中国现代史》, 首尔: 大明出版社, 1997年.
- 胡岩, 《中华民国时期中英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1999年第1期.
- 李世涛 主编《知识分子的立场: 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9年.
- 钱振纲,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1年.
- 倪伟, 《“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 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年.
-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 吴叻人译, 《想象的共同体》,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 王燕, 〈浅析第三次康藏纠纷〉, 《民国档案》, 2003年第2期.
- 周云鹏, 《“民族主义文学”论(1930-1937)》,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 潘有光, 《中东铁路研究》, 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 毕艳, 《三十年代右翼文艺期刊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年.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常设反战委员会关于满洲问题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年.
- 徐中林, 刘立敏,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的西藏政策〉, 《烟台大学学报》第21卷第2期, 2008年4月.
- 中共哈尔滨市党委研究室, 〈中东路事件的历史真相〉, 《世纪桥》, 2009年第12期.

(美)杜赞奇 著,王宪明等 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牟泽雄,《1927-1937国民党的文艺统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冷川,《万国安与〈国门之战〉》,《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周云鹏,《“民族主义文学”的文学史命运》,《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2010年 第2期.

房芳,《1930-1937:新文学中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范明明,《南京国民政府对中东路事件的应对策略及其影响》,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Abstract】

Vanguard Monthly, published by vanguard Association which was one of the core societies in the nationalism literary movement, mainly carried literary works with high artistic value, which can represent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the nationalist literary movement. It was especially true of the war novels, which gave unique interpretations of anti-imperialist war and the civil wars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ism.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had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anti-imperialism, and different attitudes on border issues, so the nationalist literary works touched upon some uncommon themes. The positive publicity of the East China Road Affair in The battle of the National Gates showed that the KMT's determination to maintain territorial integrity. Moreover, this article also ha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recovering the historical truth. The tragic description about Tibet dispute in the Victorious Death exhibits the nationalist aspirations of the

Kuomintang to work hand in hand with the ethnic minority groups for a better nation. It also proved that it was hard for the vulnerable Nanjing Government to realiz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Republicizing China in beset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Nationalist literary writers took the side of the Kuomintang, and stressed that the aim of the civil wars such as the Central Plains Wa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was for the national reunification. The Old Gold and Sanli Temple at Dusk highlighted the evils done by the warlords, giving justifications fo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while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publicity. The Longhai line and Revolution in a Flash praised the bravery of the soldiers for the national unity on the one hand, and questioned the justice of the war through the soldiers feelings of the absurdity of the civil war.

The war-themed novels in the Vanguard Monthly reflected the nationalist view of the Kuomintang, including the two aspects of resistance and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anti-imperialism and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state were the two important themes of the nationalist literary movement.

Although the nationalist literary movement was politically partisan, many writers favored spontaneously for nationalism. In their writings, they propagandized the nationalism and centralized authority in accordance to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KMT. In addition, they scrutinized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the social situations and made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ir malpractice and disadvantages.

【主題語】

전봉월간, 전쟁제재, 민족주의문예운동, 우익문학, 우익잡지

前鋒月刊, 战争题材,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右翼文学, 右翼杂志

Vanguard Monthly, the War-Themed, the nationalism literary movement,
Right wing literature, Right wing journal

투고일: 2017. 01. 12 / 심사일: 2017. 01. 20 ~ 02.08 / 게재확정일: 2017. 02. 10